

王云 著

QINGHAI ZANGZU AROUBULUO SHEHUI LISHI WENHUA YANJIU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 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王云 著

QINGHAI ZANGZU AROUBULUO SHEHUI LISHI WENHUA YANJIU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 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海藏族阿柔部落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王云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 11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1879 - 3

I. ①青… II. ①王… III. ①藏族—部落—民族历史—研究—
青海省 IV. ①K28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3568 号

策划编辑:杨 青

责任编辑:郎 洁

封面设计:刘家峰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330 千字

印 张:18. 75

定 价:42.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879 - 3/K · 2087(汉 116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杨建新

副主任： 马曼丽

编 委： 王希隆 王洲塔

李 静 赵利生

杨 青 杨文炯

徐黎丽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阿柔部落的族源及早期发展	(11)
第一节 阿柔部落世系追溯及部落起源	(12)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早期发展	(17)
第三节 阿柔部落的分裂以及阿柔三部的形成	(29)
第二章 四川石渠县的上部“杂阿柔”	(37)
第一节 “杂阿柔”部落的形成与文化遗留	(37)
第二节 “杂阿柔”部落的寺院	(40)
第三节 岭格嘛呢石经城	(42)
第四节 阿日扎乡的变迁	(45)
第三章 河南蒙旗的中部“藏阿柔”	(48)
第一节 河南蒙旗的形成	(49)
第二节 “藏阿柔”部落的形成与赞格制度	(51)
第三节 “藏阿柔”部落的藏传佛教寺院	(59)
第四节 河南县“蒙古族藏化”现象探析	(65)
第四章 下部阿柔的盛衰起伏与阿柔三部对比研究	(74)
第一节 下部阿柔部落的盛衰起伏	(74)
第二节 千百户制度的形成与沿革	(82)

第三节	阿柔部落特点解读	(87)
第四节	阿柔三部对比研究	(90)
第五章	阿柔部落的宗教信仰溯源	(101)
第一节	八思巴、达赖、班禅与阿柔部落	(101)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活佛、格西与高僧	(109)
第三节	阿柔部落的民间信仰与宗教活动	(115)
第四节	阿柔部落的神山系统与神山信仰	(125)
第六章	下部阿柔部落的部落帐房寺院	(138)
第一节	阿柔大寺	(138)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其他藏传佛教寺院	(156)
第三节	藏传佛教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	(161)
第四节	阿柔三部两种教育之间的博弈	(165)
第七章	阿柔部落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结构	(171)
第一节	藏区传统社会结构的四种模式	(171)
第二节	阿柔部落的部落制度社会结构	(175)
第三节	现阶段阿柔社会结构的二元特点	(182)
第八章	传统草原部落游牧模式向现代乡村定居模式的转型	(187)
第一节	阿柔部落传统的草原部落游牧经济	(187)
第二节	阿柔部落从游牧到半定居游牧的社会转型	(191)
第三节	藏族牧区的游牧民集中定居工程	(194)
第四节	阿柔部落集中定居工程的建设	(204)
第九章	阿柔部落的物质文化及其变迁	(213)
第一节	传统藏装及其变迁	(213)
第二节	传统饮食及其变迁	(223)
第三节	家居模式的离散、聚合与聚合中的离散	(229)

第十章 阿柔部落非物质文化的遗留与变迁	(232)
第一节 阿柔部落婚姻研究	(233)
第二节 丧葬习俗	(250)
第三节 阿柔部落的娱乐文化	(255)
第四节 阿柔部落的民间禁忌	(257)
参考文献	(263)
附录一:河南蒙旗亲王世系	(273)
附录二:访谈资料摘录	(277)
附录三:阿柔部落历代千户传略	(285)
后 记	(290)

绪 论

本书以藏族游牧部落阿柔部落为研究对象，以青海省祁连县的阿柔部落为研究重点，首次对其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了解我国藏族部落的现状，对探索其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意义

部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细胞，完整地研究一个藏族部落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可以以小见大，打开一扇深入研究我国藏族地区的窗口。目前，构成部落实体的藏族群众与藏传佛教寺院仍然存在，影响着藏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社会各领域发挥着多种功能。在普通群众，特别是在中老年人的意识层面，部落构成其归属感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将部落名称与乡村名称并用或混用，使部落具有了民间社会组织的性质，而且藏族的传统习俗往往与最原始的社会结构（即部落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新时期部落独有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与乡村制度的政治属性互为补充。现阶段，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日益成为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能否和谐稳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改善的关键因素。然而，我的导师洲塔教授多年来对甘青地区的藏族部落深入研究后发现，阿柔部落作为青海省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藏族游牧部落，至今还无人做过全面研究。因此，系统研究阿柔部落对研究我国藏族部落的变迁，对于把握藏区社会发展的特点，尤其是对于研究藏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阿柔部落的生产方式是祖辈相传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牧民按同一父系的家族血缘关系组成帐圈（མཚལ་ཁུངས་），一些血缘关系相近的帐圈就组

成了部落。^① 藏族部落有自己共同的游牧地域，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传统习惯法，在千百户的统一领导下集体走圈（即迁徙牧场），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有共同的神山信仰和神山系统。阿柔部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传统文化都深深打上了部落的烙印。在青海格鲁派教法史上，许多活佛转世在阿柔部落，阿柔活佛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拉加寺（ར་རྩ་དགོན།）、藏寺（གཙང་དགོན།）、赛宗寺（བཟང་དགོན་ཐཱ་མེད།）、阿柔大寺（ཨ་རུ་དགོན་ཆེན།）等，这些寺院对传承和保护该部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安多地区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举足轻重，是藏汉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交流的枢纽和桥梁。随着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和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唐蕃古道逐渐形成并成为历史上重要的藏汉民族通道。^② 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以及汉藏使臣往返京藏都要经过唐蕃古道。阿柔部落在北迁祁连地区以前，其“人”字形分布的一“撇”正好与唐蕃古道在青海境内最重要的一段相吻合。移牧海北后，该部落所在的峨堡镇与阿柔乡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之地，中原地区出入河西走廊的北大门，内地通往新疆的缓冲地带。峨堡镇早在清代就是青海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最早的通商口岸^③，今天，它连接青、甘、新三省国道，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汇点。

青海地区自元、明、清以来一直是藏、蒙民族融合与分化的大舞台，而阿柔部落是青海最古老的藏族游牧部落之一，从原始血缘氏族部落发展成为较大的血缘与地缘部落，虽然有过盛衰起伏的历史过程，却一直保持着部落结构的完整性与传统文化的独特性。阿柔部落的兴衰是藏蒙民族不断迁徙、分化和融合的结果，与朝廷的治青方略及部落自身的发展分不开。因此，研究阿柔部落有助于认识元、明、清时期蒙古族移牧青海后所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和青海民族史上藏、蒙两族的活动、发展、历史变迁与民族关系，有助于认识藏族部落制度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及其社会结构的演变。

本研究有助于推动现阶段我国民族学学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应用性研究领域的开拓。我国西北民族地区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只有加速发展才能逐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然而，这不是单纯的经

① 陈玮：《青海海南地区蒙藏部落的由来及变迁》，载《西藏研究》，1991（1）。

② 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果洛藏族自治州志》，654～65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③ 索巴：《青海最早的通商“口岸”——峨堡》，载《祁连文史》第二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济问题,非经济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只有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推进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区域经济梯度理论及其推移战略构架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实践。^①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国家与地区的综合实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地区软实力强弱的具体体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我国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之下,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在变迁,非物质文化在消弭,宗教信仰正在趋于弱化,语言文字正在消失,服饰饮食正在汉化,民间信仰与婚葬习俗中的传统仪式正在发生蜕变。在此情境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加以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恶化,这些人类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很快都将成为历史记忆而被尘埃封存。阿柔三部所在的藏族牧区始终远离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地域分布的边缘性决定了他们在技术、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向度的迟滞效应。因此,只有深入研究其历史传承、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社会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宗教信仰及其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探索其民族发展与区域文化发展的规律,才能在合理开发当地资源与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切实保护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提升其文化软实力,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阿柔三部地理方位的界定

根据青藏高原海拔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特点,藏族对自己生存区域的划分历来遵循着“西部为上、东部为下,南部为上、北部为下”的原则。因此《安多政教史》中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茹、下多康六岗”之说^②,即阿里地区为上部,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地区为中部,以川西、云南西北部、青、甘藏区为下部。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上路弘传与下路弘传的界定也遵循了这一规律。从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至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法为止,在西藏佛教史上称为“前弘期”。^③ 842年,朗达玛被贝吉多杰刺杀,吐蕃王朝崩溃。10世纪,佛教从东部安多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率先开始复兴,“后弘期”肇

① 李具恒、李国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基于梯度推移理论内在机理的扩展分析》,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4)。

② (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3~4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③ 尕藏加:《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52~5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始，之后从多康地区进入卫藏地区得以再度弘传的情况史称“下路弘传”，同时从阿里地区传至卫藏地区的情况史称“上路弘传”。

由于阿柔部落在历史上几经分分合合，游牧区域多有变动，因此所谓的“上部阿柔（ཨ་རིག་རྩྭ་ལ།）”、“中部阿柔（ཨ་རིག་བར་ལ།）”和“下部阿柔（ཨ་རིག་སྒྲ་ལ།）”只是相对的概念，所指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区域内的游牧方位来界定。比如，阿柔部落在元代中期第一次分裂后，南迁玉树的一支称上部阿柔，留牧在阿尼玛卿山周围的部落主体成为下部阿柔。阿柔华桑于1640年继位阿柔部落土官第10代千户时，阿柔部落按游牧区域分为上游四部落与下游七部落。在曲什安河（ཅུ་ཚུ་ཤ་ཤུ་ལ།）上游即优龙沟（དུ་ཤིག་ཤུ་ལ།）、格科（དག་ཤུ་ལ།，今玛沁县境内）、切雄河（ཁྱེ་ལ་ཤུ་ལ།）上游及云龙沟（གཡུ་ཤུ་ལ།），花石峡以南等地，阿尼玛卿山（ཨ་ཁྱེ་མ་ཆེ་ལ།）以东、以南、以西游牧的部分被称作上部阿柔；在格科及切雄河下游、温泉（ཅུ་ཆེ་ལ།）以下的黄艾沟（ཧང་ཅེ་ཤི་བ་ལ།，今兴海县大河坝草原）等地游牧的部分被称作下部阿柔。如此说来，这一时期阿柔部落的上部与下部基本上是以曲什安河一线为界的，游牧在该线以南的部分称上部阿柔，以北的部分称下部阿柔。至清代，留牧在曲什安河流域至阿尼玛卿雪山一带的下部阿柔再次分裂，部落主体北迁祁连后，阿柔三部的概念才最终形成。但如果仅就青海境内的阿柔部落来划分，河南县境内的“藏阿柔”（གཙང་ཨ་རིག་ལ།）部落被称为上部阿柔，散落在拉加寺、藏寺一带的阿柔部落被称为中部阿柔，祁连县的阿柔部落则是下部阿柔。

如果包括四川省石渠县境内的阿柔部落在内，这就是从宏观意义上讲的阿柔三部，石渠县的上部“杂阿柔”（ཨ་རིག་ཅེ་ལ།）包括散落在玉树称多县和曲麻莱县交界地带的阿柔部落散户，河南县的中部“藏阿柔”包括散落在同德、河南和玛沁三县交界处的拉加寺、藏寺一带和甘肃玛曲县境内的阿柔部落散户，祁连县的部落主体，即下部阿柔包括散落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区境内的阿柔部落散户。但为了方便讨论，本书所指称的阿柔上、中、下三部分别以分布最为集中的石渠县东区阿日扎乡、河南县宁木特乡、祁连县的三镇两乡（即阿柔乡、峨堡镇、默勒镇、野牛沟乡、八宝镇）的阿柔部落为代表。文中如果没有指出是上部“杂阿柔”或者是中部“藏阿柔”的话，所论及的则是指祁连县的下部阿柔部落，因为这是阿柔部落的主体，同时也是目前阿柔三部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居住最为分散、情况最复杂的一部。

这里需要对祁连县下部阿柔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说明。截至2008年年底，祁连县共有藏族14 300人，除了少量达玉（亦称达如玉）部落和郭米

部落以外,其他藏族人口均为阿柔部落,估计约有12 000人。阿柔乡和峨堡镇两乡的藏族都是阿柔部落,默勒镇的藏族大部分是阿柔部落,野牛沟乡和县城八宝镇也有一部分是阿柔部落。阿柔部落所在的各乡镇均为草原牧区,牧民住居与游牧十分分散,一些乡、村是与其他民族和其他藏族部落插花式杂居。因此,笔者在祁连县对下部阿柔部落的调查主要是基于阿柔乡、峨堡镇和默勒镇,以及野牛沟乡和八宝镇的一些阿柔散户,其中又以阿柔乡为重点。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比较偏重历史和宗教的基础领域,对其他方面研究较少。汉文史籍对阿柔部落的记载只有片言只语,十分简略。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关于阿柔部落的学术论文。截至目前,笔者只见到六篇论文(一篇藏文,五篇汉文),其内容都局限在对其族源与早期历史的研究方面,而对其两次大规模的分裂和阿柔三部的分布现状、社会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变、对其保存至今的古老民俗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研究至今还是空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阿柔部落实现了从游牧到半定居游牧的社会转型,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藏族游牧民定居工程将使这一转型更加深化,也必将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领域引发连锁变迁。因此,通过田野调查了解阿柔部落的现状,搜集与整理流落在阿柔部落民间的藏文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阿柔部落历史的研究,笔者通过整合汉藏文史料、在阿柔部落田野调查时搜集到的民间资料和内部资料,分析了该部落的族源与早期发展、分裂与迁徙以及阿柔三部的最终形成,厘清了其地理分布。共时(synchrony)和历时(diachrony)最初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提出的语言学理论,^①后来才逐渐应用于其他多种学科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共时和历时是指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共时法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历时法则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本书借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对阿柔三部嵌入现游牧区域后

^① Jack Richards, John Platt & Heidi Weber.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5. p79.

的变迁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研究。上部阿柔由于迁入四川省石渠县年代久远而逐渐融入了康巴文化，对自己阿柔部落的身份认同比较模糊，但该地区单一的民族人文环境使其传统文化保存完好，其宁玛派寺院阿日扎寺在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部阿柔部落成为河南亲王属民后采用了蒙古族赞格制度，但同时也催化了该地区蒙古族藏化的进程；祁连下部阿柔在与回、汉、蒙古、土、撒拉、裕固等多民族的杂居环境中表现出了更高的汉化程度，同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

对于阿柔部落的宗教信仰问题，笔者追溯了阿柔部落与八思巴、达赖喇嘛以及班禅大师之间的法缘，走访了阿柔高僧创建的多座藏传佛教寺院；解读了其民间信仰与神山信仰中的原始遗留；以格鲁派帐房寺院阿柔大寺的创建与发展、寺院结构与学经制度、建寺模式与办寺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藏区帐房寺院在我国现阶段所发挥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比研究了上部阿柔寺院教育的繁盛与学校教育的萧条以及下部阿柔的相反情况。

在社会结构方面，笔者用洲塔教授对我国藏区传统社会结构划分的四种模式理论，分析了阿柔部落处于部落制度下的社会结构以及现阶段的二元结构特点；用民族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其草原部落游牧经济和家居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研究。郑杭生教授关于社会分层的学说和赵利生教授关于社会控制的论述对研究阿柔部落的社会结构具有指导意义，这些社会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体现在民族社会的各个层面。阿柔部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从传统草原部落游牧经济到半定居游牧的社会转型必将在 2009 年新一轮五年集中定居项目中进一步深化，这将彻底改变其千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和家居模式，影响深远。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笔者研究了阿柔部落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遗留与变迁，用人类学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和民族口述史对其独特的宗教文化、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中的原始遗留进行了深描和阐释。研究发现，其传统藏装正在趋于汉化，饮食结构趋于多元，交通工具多样化，家居模式从游牧时期的分散到半定居时期的聚合，新时期多处定居点的分散形成了新的聚合中离散的特点。阿柔部落的招赘习俗与“阿柔逗曲”已于 2009 年先后入选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英国人类学创始人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 年）中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文明民族中，仍有古代文化的遗存。泰勒提出的“万物有灵论”已成为人类宗教哲学研究的基础。阿柔人具有崇尚神性的心理结构，泰勒的原始文化遗存原理和“万物有灵论”同样适用于研究阿柔部落。美国进化论人类学家和民

族学家摩尔根在广泛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基础上撰写的《古代社会》(1877年)在民族学和社会学领域影响巨大。摩尔根研究发现,在原始氏族制度下,氏族成员死后,其遗产由氏族成员继承。英国另一位进化论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1890年)中对人类的原始宗教、巫术、仪式和原始人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诠释了人类文化继替的规律。本书正是用人类学进化论的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去解析阿柔部落的古老文化的。阿柔部落的丧葬习俗与民间禁忌来源于其藏传佛教与古老的民间信仰,阿柔人将死者的部分财产捐赠寺院的财产继承法很可能是古代社会氏族成员财产继承法的一种原始遗留。

四、田野调查

笔者在青海省重点调查了阿柔部落所在的祁连县和河南县,寻访了阿柔部落明清时期在兴海县的多处历史遗迹,对同德县、玛沁县境内原由阿柔部落活佛创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进行了摸排走访,对上部阿柔所在的今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东区的阿日扎乡及其宁玛派寺院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对阿日扎寺网站跟踪关注,搜集有关网络信息,以求更深入地了解其宗教信仰与寺院的发展及社会文化功能。

祁连县政府非常重视对阿柔部落的研究,于2008年聘请兰州大学洲塔教授为历史文化顾问,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配备专车全力协助我们调查、搜集和翻译藏文资料,提供了社会关系方面的便利和资料、经费、人员等全方位的保障^①。在调查期间,笔者曾在县政府部门和乡(镇)、村政府查看档案,结合个人访谈、入户调查、住居体验,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不同手段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祁连县政协、档案局、文化局、宗教局、县志办、教育局、统计局等部门都曾为笔者光顾最多的政府部门。笔者调查了阿柔三部所在的所有藏传佛教寺院,包括阿日扎寺、藏寺、拉加寺、阿柔大寺、百户寺、德芒寺、外江寺,与寺主、活佛和普通僧人交谈,了解寺院的运行情况、活佛系统的转世情况与普通僧侣的生活情况,并搜集到部分寺院的寺志、寺院与阿柔部落之间的互动等许多珍贵的口述史口碑资料。

笔者在每次田野调查前都要精心准备,确定访谈话题,设计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对访谈内容进行笔录或录音,对调查地点和调查对象拍

^① 祁连县更藏县长和洲塔教授于2008年8月22日签署了项目协议书(祁办发[2008]59号)。

照或摄像作为影像资料存档，并和关键的受访人建立长期的电话或网络联系。截至目前，我们已搜集到藏文资料1200多页，约50万字，包括《阿柔部落史》、《阿柔大寺志》、《石藏寺志》、《阿柔部落源流》等许多以前从未公开过的珍贵孤本史料或内部资料，弥补了汉文史料对阿柔部落记载的不足。笔者在调查期间每天撰写日记，在调查结束后，对搜集到的影像资料、文字和录音资料编号保存，对有效录音资料及时整理成文字资料，之后采用民族志描述和记事的写作方法撰写田野调查报告，对所有材料加以整理、分析和归纳，以展示阿柔部落的整体特征，详细、全面地描述阿柔部落，勾画出该部落所在地区和族群的文化图像。利用现代各种传媒手段搜集信息，制作和保存音像资料，利用报纸、电视与广播以及政府网站对我国藏族游牧民定居工程的舆论导向、实施与完成情况、对阿柔三部的定居情况跟踪调查，这些都成为本人田野调查结束后后续跟踪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研究结果

笔者采用以上研究方法拓展了我国藏族部落的研究视域，丰富了其研究手段，所取得的成果填补了多项对阿柔部落研究的学术空白。

第一，阿柔部落民间现存的藏文资料对该部落起源的最早记载始于唐中期，后来在明清时期的三世和五世达赖喇嘛传记和《安多政教史》中则有了明确记载。而汉文记载发现在清代的《清实录》、《西藏志·卫藏通志》、《西宁府新志》等史籍中。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里，对阿柔部落的地理标注位于黄河上游今同德、河南、玛沁三县交界处，属玉树四十族之最东端一族。作者通过研究历史文献和对阿柔部落各乡、镇的田野调查厘清了目前阿柔部落上、中、下三部的地理分布问题，从而解决了学术领域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空白。阿柔三部嵌入现游牧地域后，与当地民族发生了许多互动，地域差异和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其在社会制度、服饰饮食、教育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石渠县的上部“杂阿柔”已融入康巴文化，但保留了一些安多地区的语言特点。在青海历史上，因蒙古族迁入引发过两次大规模的吐蕃移民过程，第一次是在明代中期，第二次始于清雍正年间。蒙古族游牧青海藏区开启了自身原藏化历程，中部“藏阿柔”部落成为河南亲王属民后，加速了当地蒙古族藏化的进程，确切地讲，就是加速了当地藏蒙两族的一体性与同质性以及族群认同的模糊性的发生过程。祁连县的下部阿柔在多民族杂居环境中，表现出了更高的汉化程度和强烈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

意识。

第二，阿柔三部对阿柔部落身份的认同及民族意识的强弱恰好与其汉化程度成反比。越是汉化程度高的下部阿柔，民族意识越浓厚，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反而越显得积极强势。阿柔三部的寺院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也成反比，藏传佛教寺院从南到北呈现出规模越来越小、宗教信仰越来越弱的渐变态势；学校教育则恰恰相反，从南到北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趋势。

第三，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乡村制度后，原有的部落制度丧失了藏区宗教属性、司法功能与军事功能，更多地发挥着地域的与行政的功能，但构成部落实体的群众仍然存在，部落观念在阿柔老年牧民的记忆中根深蒂固，部落作为一个概念的遗留开始发挥一种历史的、传统的与文化的功能，具有延续性与隐蔽性特点。因此，在我国现行的乡村制度之下，部落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和乡村制度的政治属性互为补充，形成完整的藏族社会的二元结构特点。

第四，阿柔部落自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半定居游牧的社会转型以来，在物质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迁。下部阿柔部落的服饰已基本汉化，藏族服饰成为节日与婚庆场合传统文化的一种展示，饮食结构更加多元，传统的交通工具马与牦牛已被摩托车所取代。随着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对民族教育的重视，让孩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已成为阿柔人的共识和最大追求，很多阿柔人在学校所在区域建房、租房或买房，成为家庭第二处甚至第三处定居点，家居模式定居点的分散具有离散式与割裂式特点，但又与以前的分散游牧不同，具有聚合中的离散的特点，这一家居模式对阿柔人的婚姻与家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对藏区游牧民的定居问题做过重要批示。2009年，在国务院藏族游牧民定居工程的重大决策之下，青海省新一轮的五年期定居工程全面启动，阿柔部落所在各乡、镇被全部覆盖。预计至2013年底，阿柔人将从半定居游牧的分散定居模式转变到以县城、乡（镇）、村为依托的集中定居模式，这也就意味着其社会转型必将进一步深化，其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也必将加快，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跟踪调研。

第六，阿柔部落的婚俗十分古老，20世纪80年代以前还保留着暮合朝离的“串帐”习俗与早婚现象。基于“烟火不断，香火不断”的传统认知，阿柔人认为香火不一定要靠儿子来传，女儿女婿也能传宗接代，形

成阿柔部落赘婚的理论基础。“串帐”与赘婚现象的存在体现出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遗留。阿柔人的婚礼至今仍保留着“一桩婚姻，两个婚礼”、巴丹习俗、打茶、女性婚后的忌名习俗、不落夫家等诸多原始仪式与习俗，婚礼上的“阿柔逗曲”和招婿习俗已入选青海省 2009 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本书突破了我国藏学界研究藏族部落时偏重历史和宗教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手段的单一性，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对该部落的藏传佛教信仰及其寺院、社会转型以及保存至今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中原始遗留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